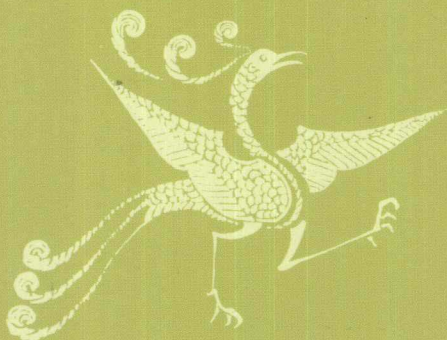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康熙与清初文坛



黄
建
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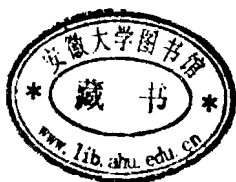
清代是继唐宋之后的又一个文化高峰，各种文体亦全面复兴。康熙一朝，文士杰出者尤多。作为雅好文艺的康熙，始终重视构建一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本书分为“康熙与清初文人”、“康熙与清初文学”两个部分。前者考量在康熙文艺政策之下的文人生存状态，突出翰林院及人文最盛的江南在清初文学中的结构意义；后者从文论、文体及文集编纂等方面勘察清初文学与康熙的关系。总之，康熙正是以其独具的政治优势影响了其时的文人心态，左右着当时的文学生态，决定了清代文学的整体走向。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康熙与清初文坛

黄建军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熙与清初文坛 / 黄建军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9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8127 - 5

I. 康… II. 黄… III. ①康熙帝(1654 ~ 1722) —人物研究②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研究 —清前期 IV. ①
K827=49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159281 号

书 名 康熙与清初文坛

著 者 黄建军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罗华彬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2 $\frac{3}{4}$ 插页2 字数 360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127-5

定 价 58.00元

序

大约十多天前,建军来信说,他的《康熙与清初文坛》书稿通过了中华书局的评审,即将纳入出版计划,并嘱我为序,我看了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围绕着康熙的话题,他沉潜了六七年之久了,以他的勤奋和敏锐,该是可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成果的时候了,所以在今年6月份他的博士论文外审和答辩等环节,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这也让我想起2007年他参加博士生复试时,就已经提交了比较成熟的论文构想,其中有的章节更是已经写出了初稿,所以在博士论文选题和写作上,建军几乎没让我多操心。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自来就多好文艺者,有些且深有造诣,如南唐李煜、北宋赵佶等还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从总体来说,现行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对帝王的关注还是较为薄弱的。实际上,帝王不仅以其自身创作常常“垂范”一时,而且因其地位影响到当时的创作走向。在文学研究格局大张的今天,将帝王的文学及文学思想梳理出来,不仅可以使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更趋丰满,而且可以从中勾勒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流脉。所以早在十多年前,我与吴承学教授合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刊《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一文,就在“展望”的部分提出了要加强对帝王文学思想研究的话题,只是我们本身,因为研究项目或研究兴趣的原因,没有在这一领域钻研下去,有所作为。现在有建军的论文,也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

清代是唐宋之后的又一个文化高峰,在多种文体上全面复兴。有清一朝,绵延二百七十余年,嘉庆以后虽多罹忧患,但康、雍、乾之时,从总体上堪称河海晏清,文运昌盛,朝野之中,赋诗作文,蔚成风气。康熙一朝,文士杰出者甚多。如何在纷繁的文学格局中寻索出清代文学思想的发轫及发展轨迹,康熙在这种学术追问中体现出他伟岸的身影。建军拈出“康熙”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觉得他是有眼光的。论

文大别为“康熙与清初文人”、“康熙与清初文学”两个部分。前者考量在康熙文艺政策之下的文人生存状态,突出翰林院及人文最盛的江南在清初文学中的结构意义;后者从文论、文体及文集编纂等方面勘察清初文学与康熙的关系。这一研究格局,我认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握清初文学的生态特征,展现清初文学的丰盈魅力,因而也显示了作者不同凡响的研究气度。

学术研究可以是一种职业,也可以是一种事业。作为职业的学术研究,大多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而作为事业的学术研究,则更多的是超越于现实利害基础之上的精神追求。后者彰显了更为纯粹的审美意义。审美总是伴随着快乐,我在与建军朝夕相处的三年中,感受到学术给他带来了许多的快乐。我简略地回忆了建军在康乐园的三年,发现他的笑容主要绽放在两种场合:一种是刚刚找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或者完成了某个章节,与我交谈时,他的笑容是如此的纯净和热烈,简直无法掩饰——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掩饰;另一种是在我们师生的聚会上,建军素擅饮而能得其真趣,所以酒宴上的建军总是端着酒杯,眯着眼睛,似乎沉醉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我总想,一个人如果没有生活的快乐,则学术的快乐也是孤单的。建军应该是一点也不孤单的。

建军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是到了康乐园,他才被“凿开混沌”的。这是文学语言,不能当真,我更是不相信的,因为他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就分明是清澈的。我知道建军一直在追求通透敞亮的学术之境,这是一个虽美却难、虽难却美的境界。但我相信经历了从容含玩的学术过程,他总会达到的。

我期待着。

彭玉平

2010年9月18日

目 录

序	彭玉平	1
绪 论		1

上编 康熙与清初文人

引 言		13
第一章 康熙对翰林院词臣的管理		21
第一节 翰林院的设立与职掌		21
第二节 康熙对翰林词臣文学职能的重视		38
第三节 康熙朝的翰林与文学史演进之关系		51
第二章 康熙管理地方文人的策略——以江宁为中心		78
第一节 江宁巡抚的选派		79
第二节 曹寅、李煦二织造的特殊价值		89
第三节 康熙与江南文人		105
第三章 康熙与清初文人的诗文交往		122
第一节 康熙出巡与词臣的文学活动述略		122
第二节 康熙赐赠与文学		137
第三节 词臣们的其他恭和、应制类诗歌		150
第四节 康熙与清初文人交往之影响		160

下编 康熙与清初文学

引 言	207
第四章 康熙与清初诗	213
第一节 康熙的诗论	214
第二节 康熙与清初唐宋诗风的消长	223
第五章 康熙与清初其他雅文学	262
第一节 康熙与清初词	262
第二节 康熙与清初赋	272
第三节 康熙与清初文	286
第六章 康熙与清初俗文学	308
第一节 康熙与清初戏曲	308
第二节 康熙与清初小说	322
结 语	332
主要参考文献	341
后 记	357

绪 论

一、一个期待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的叙写中,重心往往是重点作家、重点作品;在把握重点作家、作品的语境中,又往往侧重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在注重思想内容的传统模式中,又共同边缘化了文学史演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帝王。张明非在《帝王文化与中国文学》中曾如此感叹:“长期以来我们只看到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廷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分类,对于帝王这一特殊的创作群体,对于帝王文学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之外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诚然,总体而言,帝王文学成就不高,难与历代那些杰出的文学之士争胜,但归根结底,是与长期影响我们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观念有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当世界已经进入 21 世纪,重新认识和评价帝王文学这一独特而又历史悠久的客观存在,自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①其实,帝王还以其独具的政治优势左右着文人心态,影响着其时的文学生态,在文学史演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多数文学史叙写中也同样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种忽视帝王的文学地位和他们在文学史演进中作用的倾向在清代特别是康熙一朝表现得尤其突出。作为清朝定鼎北京后的第二任帝王,康熙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政

①张明非《帝王文化与中国文学·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版,第 2-3 页。

另:后文中凡见于同一文献引文,只标注编著者、书名、卷数及页码,版本等一律从略。

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文治而兼武功”、“守成而寓创业”,开创了绵延一个世纪之久的“康乾盛世”,为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但学术界似乎更多的是关注政治、军事、思想层面上的康熙皇帝,各种研究专著、论文蔚为大观,却不太注意他的文艺活动及他与清代文学生态的关系。这显然不能给康熙这个人物作出正确的历史定位,更不能真实反映文学史演进的内在规律。

毋庸讳言,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行的真正动力。但如恒河沙数的普通人民就像无数水分子一样,如果不有序运行,就不可能形成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那么能够聚合这无序运行水分子般的普通民众的人物,当然就是英雄。所以说英雄创造历史也并非完全无根之谈。大浪淘沙,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迹的往往就只有极少数英雄,或精英阶层。历代帝王,特别是奋发有为的君主当然是精英阶层,更是承载历史信息的主要元素。大凡书写历史的史学家,无论是依据国别体、编年体,抑或是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帝王的言行总是历史叙述的重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在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宋代朱、陆并重,到清代独崇朱子理学,最高统治者对精神文化的控制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思想也必然对社会思潮、时代风气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产品,自然也会受到帝王制度及其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①,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②;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明帝复兴儒学,文学中涌

①(南朝)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时序》,岳麓书社,2004年9月版,第416页。

②钱仲联《康熙诗词集注·序》,见王志明、王则远《康熙诗词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页。

动着复古之潮流;清代以异族入主中原,却倾心先进汉文化,注重总结前人各项优秀成果,中国古典文学呈现集大成的态势。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探讨“质文代变”的规律时也明确指出:“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风生则水起。虽然时常能听到诸如“真诗在民间”、“好诗在草野”之类的说法,但帝王总会以其特殊的政治角色,以其话语霸权,引导文艺思想朝着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轨迹运行,这一点在清代表现得尤其突出。严迪昌先生在其《清诗史》中如是说:

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制控的!

.....

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全力实施诗文化的投入,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原导自满族皇权集团固有的,有异于前朝皇室群体的复杂心态。说到底,它乃是汉人素持的“夷夏之防”观念从负面投向新朝集权统治者心理上的阴影,推促着他们急遽的糅合有自信又自怯、自大又自卑的心态律变。要稳固入主中原后的政权,必须在以“武功”起家平天下的同时,迅速辅以“文治”,来收拾民心,钳制民心。特重“文治”,强调到与“武功”并,对挥八旗铁骑入关的清皇室来讲,无疑是心智远高于他们的先祖的。强化以儒治儒,较之一般所谓的以汉治汉,显然更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文治”,即强化文化统制,而舍去“儒”术,实无从“化”起,亦难收其效。而诗作为心灵之窗,作为高层文化之一种,特别又与科举文化密相复合,实在是变演风气、制约心态的关键之环,足以带动其他文艺之事。在“文治”之长链中,制控住诗这一最敏捷、最灵动、最易导播的抒情文体,对制约、网罗、笼络、消纳汉族士子的心性,也就把握了一种主动性和制控权。^②

这种对诗歌领域的总持,其实完全可以移植到清代所有的文体现象。

①(南朝)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时序》,第408页。

②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7-18页。

清朝统治者在“武功”平定天下之后，迅速辅以“文治”，而诗文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文体自然是统治者制约、笼络汉族士子心性最好的载体。将文艺之事运用于文治之中最为成功的清帝无疑是康熙，故这段话又可以说为康熙而发。

清初文坛的发展与康熙的爱好存在太多的关联。首先康熙一朝的文艺政策，诸如优礼文艺人才以笼络其心，从而组建和巩固适合封建统治的创作队伍；反对浮饰之言以提倡文质适中的文风；“经史为要，诗赋次之”的文体观以及间兴文字狱以整肃士林等，都对制约文人心态和规范当时的文坛走向影响深远。

其次康熙亲自操觚染翰，以帝王兼文人的双重身份参与当时的诗文创作，并带动一批天潢贵胄陶铸文学，形成一股追步甚至超迈唐宋的“朱邸”文人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康熙本人存世作品《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共四集一百七十六卷，包括诸如诗、文、词、赋等文学创作及相关的文艺评论，足以反映康熙较深厚的文艺修养。至如雍正、乾隆及其他皇室子弟的作品集更是非常丰富，铁保收录之《熙朝雅颂集》，盛昱、杨钟羲所辑《八旗文经》以及恩华等纂辑《八旗艺文编目》可窥一斑。

更为直接的是，康熙以帝王之尊广交文人。治清史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清初学界的主要大家大都生活在康熙朝代，即便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家，他们虽排斥新朝，却也都与康熙皇帝存在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至于纯粹文人与康熙的文学交往活动更是直接，且不说诗文地位相对次要的熊赐履、高士奇、张英、陈廷敬、汤斌、徐乾学、李光地、宋荦以及规模不小的“朱邸”文人群体与康熙帝文学交往频繁，纵然是“清初六大家”的王士禛、朱彝尊、宋琬、施闰章、查慎行、赵执信也大都与康熙有诗文交往的记录，盛名如王士禛者之所以能够主坛坫近五十年，也与康熙的拔擢不无关系。

康熙与清初文人文学交往最明显的记载，当是高士奇《蓬山密记》中记录康熙的一段读书心得：“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及朕密令内侍张性成钞写古文时文，读之久而知张性成不及。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高士奇夙夜勤劳，应改即改。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逐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

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①从“心中羡慕”到自己“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这是普通学子的一种微妙体验和长进,能有这种收获,说明康熙对文学已入乎其内、耽乎其中了。从最早入值南书房的张英、高士奇,到随后奉召进入的翰林陈廷敬、王士禛、张玉书、孙在丰、朱彝尊、徐乾学等人,几乎都是当时引领文坛的风云人物,他们在陪伴康熙皇帝吟诗作画、剖析经义之时,必能影响年轻帝王的文学宗趣。同时更可以生出另外一种猜测:康熙对身边文人的文学趣味是否具有反影响,是否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譬如“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的王士禛为何晚年重返“唐音”,并最终以其“神韵”诗而作为“盛世元音”的圭臬?这与他于康熙十七年(1678)入值南书房并于十九年(1680)迁擢国子监祭酒是否有必然联系?朱彝尊于康熙十八年(1679)参加博学鸿儒之试后为何文风骤然改变,其人亦由早期的坚定反清复明者变为新朝的积极拥护者?因观看《长生殿》而获罪的查慎行为何晚年得到康熙重用、突然被招致南书房,其《赴召》、《随辇》、《迎銮》等集中近千首恭和、纪恩之诗该作何解读?又如因罹《南山集》案而入狱的方苞,缘何突被天恩,并以白衣入值南书房,留下《万年宝历颂》、《两朝圣恩恭纪》这种纯乎颂圣的逢迎之文?特别是清代唐宋诗风的此消彼长、骈文和辞赋的中兴以及戏曲的宫廷化、小说的生存维艰等与康熙皇帝到底有何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极具魅力,也极有价值。只有对康熙与清初文坛乃至清代文人的文学创作做一个整体观照,才能得出结论。

二、相对不足的研究现状

尽管康熙在清初文学的定型和促进其全面繁荣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涉足康熙诗文领域包括康熙与清初文坛交往之关系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纵然是曾经影响广泛的文学史著,如游国恩、刘大杰、社科院、郭预衡、罗宗强、袁行霈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都未就此予以充分论述。正如钱仲联先生在《康熙诗词集注》一书的序中说:“康

^①(清)高士奇《蓬山密记》,《历代日记丛钞》本,第18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271页。

熙武功文治,号迈前古,其诗篇浩瀚,流传三百载于兹,而研讨者鲜。”^①三百年来,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而钱先生无暇及此,研究的责任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学人身上。

检讨三百余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康熙诗文研究现状,除了《四库全书》收录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和此集的个别影印本外,真正的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首先,著作方面先有1984年卜维义、孙丕任选注的《康熙诗选》,继有王志民、王则远叔侄1994年编著的《康熙诗词集注》等,但二书都仅仅停留在对康熙文艺著作的编辑和注释上。除此之外,其他相关的论著也为数不多,根据2003年阎崇年主编的《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②,大致情况如下:1990年张菊玲所著《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作为满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性学术专著,却对康熙在满族文坛的地位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只是在第二章用几百字概括康熙的文学成就^③。1992年金启琮、张佳生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简编》,该书则侧重满族历史和文化,仅第九章《满族文学及其发展》提及到康熙帝“诗大多气势雄浑、格调高昂,表现出满族兴盛期的民族精神面貌”,也并未作深入分析^④。1993年张佳生的《清代满族诗词十论》显然对满族诗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有点有面,对满族诗歌的概貌、特点言之甚详,但对康熙诗文的评价实际上还未超出前书的框架,且也只是寥寥数语^⑤。1994年王佑夫主编的《清代满族诗学精华》则除了介绍了康熙的一篇诗论《诗说》外,还在《前言》中高度肯定了康熙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满族文学源远流长,但直到康熙临朝后,才得到蓬勃发展。满族诗学也正是在这时得以产生。”^⑥进而肯定了康熙“对振兴清初诗坛,尤其对满族诗歌创作与诗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勾勒出了满族诗歌理论的基本轮廓”^⑦。立论显然超出前有成果,但毕竟只是一部书的前言,匆促之言,难以完整反映康熙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满族文学集大成之作当属董文

①钱仲联《康熙诗词集注·序》,见王志民、王则远《康熙诗词集注》,第1页。

②阎崇年《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③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1月版。

④金启琮、张佳生《满族历史与文化简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⑤张佳生《清代满族诗词十论》,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2月版。

⑥王佑夫《清代满族诗学精华》,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页。

⑦王佑夫《清代满族诗学精华》,第3页。

成主编的《清代满族文学史论》，该书专门用一章介绍了《无比丰富的清代帝王诗作》，充分肯定了帝王诗的研究价值，并对康熙诗的情况做了论略，认为“著文学史者，于清诗一章，似无人提及玄烨，恐有失公允”^①。但三千字左右的论略，依然无法还原康熙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倒是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虽没有专门对康熙的诗歌及其地位进行论述，但对以康熙为代表的清王朝利用诗文强力干预文坛走向和对满族文学的繁荣推动之功定性准确（见前述），对拙著的研究无疑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导引作用。目下广为流行的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在清代部分之“绪论”中，虽设专节介绍了“文化专制下的学术和文学”，对康熙独尊程朱理学，重用魏裔介、熊赐履、汤斌等理学名臣，大规模编书，偶兴文字狱等或有提及^②，但依然没有对康熙的文学地位进行定论。另张明非《帝王文化与中国文学》、赵永纪《清初诗歌》和朱则杰《清诗史》等书也有论及，但都没有超过严氏之观点。

其次，有关康熙文艺思想及影响研究的单篇论文并不多，且尚未成体系。如：宁昶英的《报国应同竹节坚——试评康熙诗的爱国主义思想》^③，作者高度评价了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创作的诗歌，认为这些诗歌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王志民则有《论康熙诗词的思想和艺术价值》^④和《谈谈康熙后期诗歌的特点》^⑤二文，文中主要观点有三：一、康熙诗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二、康熙诗词突出表现了诗人的民本、“德”治思想及爱国主义精神。三、指出康熙又是“北方诗派”的一名特殊诗人，其诗词具有独特的风貌和内在风骨。而武原所著《康熙皇帝的军旅诗简论》^⑥关注的则是康熙的军旅篇章，认为这些诗章往往与国家的统一事业相关，最

①董文成《清代满族文学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72页。

②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34—235页。

③宁昶英《报国应同竹节坚——试评康熙诗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国民族》，1986年第10期，第42—43页。

④王志明《论康熙诗词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70—79页。

⑤王志明《谈谈康熙后期诗歌的特点》，《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79—83页。

⑥武原《康熙皇帝的军旅诗简论》，《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47—50页。

富有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康熙强烈的国家统一意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道劲雄健的阳刚诗风依然能使人读之心动。至于于翠玲的《康熙“文治”与词学走向》^①一文就康熙皇帝实施“文治”的两项举措对清代词学发展的走向有深刻影响展开探讨:一是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天下名士,这使当时有影响的词人朱彝尊、陈其年等身份地位和心态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了当时词坛创作风气的转向;二是全面整理文学文献,包括《御选历代诗余》和《御定词谱》,这使在特殊时代背景下自然复兴的词学,被纳入了官方认同的“诗教”正轨,并对词学文献整理成为官方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起到了示范作用。如果以上专家更多地注重微观分析,那么马清福的《爱新觉罗·玄烨的诗文理论》^②和张佳生的《康熙朝满族文学兴盛的原因》^③两篇文章则注意从宏观高度建构体系。前者侧重从康熙的诗歌理论和散文理论两方面构建康熙的文学理论观,承认康熙是儒家诗教观的忠实实践者;后文则从开科举、扩大八旗教育范围、推崇理学、编纂书籍等诸方面探讨了康熙一朝满族文学兴盛的原因。

第三,有关康熙与清初文人的诗文交往及影响的研究方面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今学界在清诗包括对单个诗人如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等清初大家研究方面之论文甚多,对他们在康熙朝的文学史地位描述准确,对他们进入官场或成为康熙文学侍从之后各自的诗风转变也多有论述,但基本上都只注重结果,而忽视了过程,也就是忽视了康熙与这些大家诗文交往的细节,而细节往往最能还原历史真实。当然重视细节则需要钩沉史实,爬罗剔抉。

通过上述简单的梳理,可以得出,康熙文艺思想的既往研究成果呈现如下几个特点:一、相较于康熙的史学地位研究之蔚为壮观,对其文艺探讨过于沉寂。二、重视诗歌的研究,相对忽视其他文体的研究;单就诗歌领域而言,则是重创作,轻理论。三、成果虽然不少,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四、对康熙与当时文坛风云人物的文学交往过

①于翠玲《康熙“文治”与词学走向》,《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40-44页。

②马清福《爱新觉罗·玄烨的诗文理论》,《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第19-25页。

③张佳生《康熙朝满族文学兴盛的原因》,《满族研究》,1995年第1期,第52-57页。

程的考察及相互影响关注不够,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康熙在文学史上的作用稍显模糊,无法还原康熙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而这恰恰是拙著关注的重点。

要解决这些研究瓶颈,不仅要探讨康熙自身的诗文创作和理论,而且应当从康熙与当时文人的诗文交往方面进行求证,探讨其相互作用与影响。因为帝王的文学交往活动及思想是封建时代特定的产物,有其认识价值,值得学界的特别关注。

三、本书的基本特点

本书将运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入文学史的过程研究,同时结合采用我国传统的史料搜集、史料辨伪方法,还原康熙时代某些文学现象发生的历史真实。作为一代帝王,康熙的每一件文学作品、每一次重要文学活动或每一种文艺理念的产生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如果能将这些问题历史化,就更加容易把握他如何借用文艺这个载体为其安邦治国服务,也可以为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某些借鉴。

拙著的基本特点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结构的系统性。近年来,学界关于康熙诗歌的研究论文虽然已有十篇左右,对其诗文理论研究的也有好几篇,但对康熙的整个文学成就研究一直未能形成系统,特别是康熙的词、赋、文更少有关关注的目光。本书将结合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分别探讨康熙与清初诗歌、词、赋、文等传统雅文学以及他与清初戏曲、小说之关系。同时通过钩沉康熙与以翰林院为首的文学侍臣和以江南为主的地方文人群体的各种文学交往史实,进而探讨康熙对整个一朝文人心态和文学生态之影响。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

第二,观点的原创性。尽管康熙的历史地位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基本定论^①,但迄今为止,学界几乎没有人关注康熙在清初文

^①刘大年《论康熙》,见《明清人物论集》(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50-55页。

坛的定位,更少有人沉潜史实,勾勒出康熙与清代文坛走向之关系。拙著认为,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对职司文翰的翰林院众词臣以及人文氛围浓厚、以江宁等为代表的地方文人之经营,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同时康熙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通过与足以带动整个文坛风气的领军人物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目中的“文治”。这种研究在国内外尚属空白,拙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只注意康熙史学地位的局限,促进对康熙的研究走向一个更新的高度。

第三,较高的史料价值。《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如此丰富而又庞杂的史料,就必须有人排比史实,披沙拣金,本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即为笔者第一次挖掘整合。至于康熙与文学侍臣的详细诗文交往活动,也多是笔者从众多的时人文集及其他野史笔记如《松亭行纪》、《陪猎笔记》等中逐条整理而得。像熊赐履、高士奇、张英、汤斌、王士禛、陈廷敬、徐乾学、韩菼、朱彝尊、宋荦、查慎行、方苞等翰林词臣在康熙身边时间或长或短,与康熙的文学交往活动或多或少,君臣之间的影响或深或浅,但这些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却可为君臣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可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

至于其中一些作品、史实,本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去伪存真,或有所补正,或提出质疑。如陈廷敬的《阅农诗》、《七月二十一日赐宴瀛台迎熏亭恭纪二十韵》等几首诗歌时间的重新考证,《词林典故》所载翰詹大考的资料补充,以及康熙文集可能漏收的诗歌存疑等,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